



美俄之间会有大交易吗？

柯克·贝内特¹

编者按：特朗普上台以来，美俄关系一度出现转暖迹象，随即又跌入低谷。美俄之间究竟有没有可能达成传闻中的“大交易”？对此，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贝内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他看来，不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乌克兰，美俄都存在根本分歧，难以达成妥协。他建议，美国应该对俄罗斯采取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阻止俄罗斯破坏欧洲安全；同时应该管控分歧，减少摩擦，避免在人权、中亚等问题上与俄对抗。这一观点体现了从权力政治而非意识形态出发认识和处理美俄关系的思路，值得关注。

实际上，可能不会有什么大交易。

特朗普，这位爱做交易的新任美国总统，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处理大国关系。很多人猜测，美俄或将在叙利亚或乌克兰问题上有所交易。比起徒劳地追求基于所谓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战略伙伴关系”，精明的交易型外交也许代表了一种进步。然而，这种外交会很快受到质疑：美俄在叙利亚或乌克兰问题上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交易；更广泛地说，双方都不能指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所期望的利益。

¹ 柯克·贝内特（Kirk Bennett）是美国前外交官，著有大量有关俄罗斯与后苏联地区的文章。本文英文原题为“The US and Russia — What’s the Big Deal?”，载于《美国利益》网站：<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7/02/13/the-us-and-russia-whats-the-big-deal/>。此为中文摘译版。

在叙利亚，在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之间形成的谈判框架将美国作为一个糊涂的旁观者排除在外。这反映了叙利亚的实际情况。上述三国都派出了地面部队，叙利亚军队则做好了听命于它们的准备。当华盛顿明智地决定限制其对叙利亚的直接军事介入，并且放弃在该地区领导人废立问题上发挥作用时，它也就放弃了在谈判桌上谋求一席之地的筹码。

特朗普阵营的指导方针是让美俄在打击 ISIS 上合作。莫斯科无疑会对联合打击叙利亚的“恐怖主义”表示欢迎。这类似于奥巴马时期的分工合作：美国打击 ISIS，俄罗斯则打击 ISIS 以外的叙利亚反对派。对俄罗斯而言，更重要的是攻陷阿勒颇，摧毁 ISIS 一直不是其首要任务。因此，强调美俄在叙利亚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无法带来真正的合作。

对美国而言，眼看阿勒颇遭到摧毁而无能为力，是一种失败，将来还会有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如果阿萨德政权恢复对叙利亚全境或大部分地区的控制，那么伊朗经由陆路进入叙利亚将不再受到限制，这将再次为德黑兰借道破坏黎巴嫩和以色列提供方便。对于意图对伊朗强硬美国政府而言，这不是一个好兆头。由于阿萨德政权虚弱，伊朗在东地中海的野心或许会暂时收敛。但俄罗斯不会去制约伊朗的野心，早在莫斯科与德黑兰在叙利亚内战中成为实际的盟友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在纵容伊朗的行动。围绕伊朗在叙利亚的角色，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什么一致的利益。事实上，俄罗斯的“反恐”联盟中包括真主党——它自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恐怖组织，还包括伊朗这个恐怖主义的首要支持国。无法想象，美国在这个邪恶联盟中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或者说美俄在叙利亚还能达成什么互利的交易。

乌克兰的前景并不比叙利亚强多少，尽管原因截然不同。一般认为，俄罗斯或许会将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归还基辅，以换取西方撤销制裁、对俄罗斯掌控克里米亚的默许以及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乌克兰中立化协议。然而，这种表面上合理的设想却暴露了对这场冲突的根本误解。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只是为了阻止北约东扩，那么这场交易或许会令人满意。但事实上，这样的解决方式将意味着莫斯科的投降，多数俄罗斯人都会这么看。莫斯科不是希望乌克兰变得像奥地利，而是希望它至少像白俄罗斯，如果能像克里米亚那样与俄罗斯紧密结合甚至被俄罗斯吸收，就更好了。一个

中立、独立的乌克兰，即使失去克里米亚，也将标志着俄罗斯同化乌克兰人——将“小俄罗斯人”转变为“大俄罗斯人”——这一长期努力的终结。这对于建立“俄罗斯的世界”和“欧亚联盟”的野心而言，会是致命的打击。

即使莫斯科愿意默认失败，并且就乌克兰中立化进行协商，还会有另一个障碍。1994年，乌克兰曾在犹豫许久后放弃核武，但所换取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表述含糊，最终导致没人去尊重或保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吸取了惨痛教训后，对于接受任何远不及北约第五条所提供保证的协定，乌克兰都将保持警觉。要向乌克兰人兜售“中立化”，那么祝好运吧。

根本问题在于，即使面对大量证据，俄罗斯还是否认其在顿巴斯曾有任何驻军，以此逃避从那里撤出军队及装备的义务。莫斯科想嵌入一个由其控制的、在乌克兰治理进程中拥有否决权的顿巴斯，并且让基辅承担维持和重建这一地区的财政负担。基辅方面则采取“你破坏，你买单”的办法。克里姆林宫设想，倘若能通过西方给基辅施加足够的压力，乌克兰便会接受俄罗斯的条件。但利益上的根本分歧难以支持这样的折中办法。

不论在叙利亚还是乌克兰，真正可以进行交易的东西都很少。这似乎并没有打击特朗普政府中热衷于做交易的那些人的热情。美国之所以想与莫斯科寻求妥协，似乎是因为在美国看来，有比俄罗斯更迫切的安全挑战。面对一个愈发自信而强硬的中国，一个摆脱了孤立的、好斗的伊朗，还有激进伊斯兰，以及一个令人捉摸不透、且有核能力的朝鲜，难道我们不应该和俄罗斯达成最好的交易，以便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其他地方吗？

尽管设定优先事项、选择自己要打的战役是外交政策中值得称赞的现实主义，但将俄罗斯移出美国的麻烦制造者名单，甚或希望争取俄罗斯的援助以对抗其他问题国家，却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无论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有何种差别，这些国家都被强烈的复仇主义联合在一起。它们的利益迥然不同，要结为真正的盟友是不可能的事，但在短期到中期内，它们仍是事实上的战术合作者。只要它们都力图对国际秩序以及它们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进行激进的修正，且美国继续充当维持现状的支柱与担保人，它们就将合作下去。

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政策问题是，今天的俄罗斯与当年的苏联有什么区别。俄罗斯现在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识形态工具，能使它对美国的盟友和其他附庸国煽动革命；它影响西方选举的能力也有待评估。与俄罗斯的这场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是限于欧洲内部的，即使是在欧洲内部，也几乎完全是在后苏联地区。并不会会有红军聚集起来突破富尔达峡谷，并夺取半个西欧。俄罗斯军队只会公开或暗中对周边地带进行袭击，以扭转其周边国家的离心倾向，同时削弱后冷战时代欧洲的安全结构。

新一届美国政府会听到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避免采取遏制战略，因为俄罗斯过于庞大和重要，无法将其孤立起来。但遏制和孤立并不是同一回事，即使这两者经常一前一后地出现（例如在伊朗问题上）。就俄罗斯而言，遏制而非孤立，正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我们不需要去对抗一种恶性的意识形态，推翻一个怀有敌意的政权，或在全球各地的战场上奋力斗争。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确保俄罗斯会遭到坚决抵抗，付出严重代价。当克里姆林宫挑战欧洲安全的底线时，我们需要保证莫斯科面对的将是尖锐的矛头，而不是软柿子。

除了遏制所必需的措施之外，西方没有必要全面地孤立或惩罚俄罗斯。我们不必担心俄罗斯转向亚洲。莫斯科已经认识到，国内腐败和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政治风险，将吓退亚洲的资金。我们也不必担忧俄罗斯的一些后苏联地区邻邦自愿选择或多或少地与莫斯科结成紧密的联盟。

尽管我们与俄罗斯之间不会有改变规则的大交易，新一届美国政府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缓和摩擦，以便管控的双边关系中的分歧。

首先，在人权问题上，以往俄罗斯向西方政治体制转型的时候，与其就人权和民主化问题进行频繁接触非常合理。然而，眼下俄罗斯的政治轨道却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对每一次俄罗斯没有满足西方标准的行为吹毛求疵，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程式。我们必须认识到，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不再建基于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或标准。我们影响俄罗斯人权环境的能力极其有限。对人权问题采取虚张声势的姿态，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仍然有机会去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恶劣行径，但吹毛求疵的找茬行动应当停止。这样做的好处是，减轻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把“政体变更”摆在对俄政策核心位置的想象。

其次，华盛顿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扮演角色的态度。俄罗斯（和中国）正以一种总体上有益的方式，广泛而深入地涉足这一地区，为

其提供安全、贸易和投资。美国应当考虑到俄罗斯在这一地区阻遏伊斯兰激进主义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避免在中亚地区与莫斯科对抗。当然，如果克里姆林宫决定将哈萨克斯坦北部作为下一块要收复和解放的“领土”，美国的善意将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最后，新一届政府应该考虑到，交易型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大妥协，负面的诱因可能同样有效。比如，在莫斯科下一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武器交易时，华盛顿可以提出向乌克兰提供反装甲装备。这样一种交易型的手段更有可能对克里姆林宫产生影响。倘若有人提出，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是不负责任的，我会这样回答：这么做不负责任的程度远远不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武器。

不论主观倾向如何，特朗普政府和克里姆林宫都会发现双方难以达成大交易。认为我们在抑制伊朗方面能和俄罗斯达成交易，或是俄罗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中国的崛起，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样地，莫斯科在后苏联地区的大多数挫折都应当归咎于其自身的行动，即使与华盛顿进行再多的斡旋和交易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沈丽颖摘译，归泳涛校）